

草》遗漏的药物为主,约于739年撰成《本草拾遗》,计序例1卷,拾遗6卷,解纷3卷,共10卷。序例文佚,据考证,现存有“十剂”的说明及五方之气致病的原因。拾遗部分对《新修本草》作了补充,增加了许多药物,仅矿物药就增加了110多种。解纷部分为解除旧本草药物品种纷乱而设,有很多新的见解,所辨药物大多是《新修本草》中的品种,指出了其中某些错误。除考证品种外,对性味功用也有辨析(如姜黄、接骨木等)。

《本草拾遗》是唐代仅次于《新修本草》的一部重要本草。该书新增加药物692种,为《新修本草》新增药物的6倍。引用书籍116种,收罗药物资料十分广博,且考订精细。尽管其中有很多是冷僻甚至是荒诞的药物,但确实对本草文献和民间药物一次大规模的厘定与总结。

该书的缺点是收罗过于庞杂,部分药物的功用只凭文献记载而缺乏实际经验。尤其是“人肉可疗羸疾”之说,给后世留下了不良影响。

3.《蜀本草》 该书是《本草拾遗》后200多年,在后蜀统治者孟昶的倡导下,由五代时期本草学家韩保昇等人编撰而成。它以《新修本草》为蓝本,并参考有关文献进行增补注解,除增加新药外,还配以《图经》,全书共20卷,原名《重广英公本草》,后世称《蜀本草》。该书新增药物有辟瘟雷、地不容、胡黄连、山胡椒、灯笼草、金樱子等10余种,在内容上常有自己的观点,对药物性味、功用、形态和产地增加了很多新内容。书中还统计、整理了前人本草中涉及的药物七情畏恶资料,后世常说的“十八反”,即源于此书“相反者十八种”。宋代掌禹锡《嘉祐本草》引用该书的资料涉及药物276味。原书早佚,但在《证类本草》中可以看到其主要内容。

4.《药性论》 对该书的作者颇有争议,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曰:“《药性论》,即《药性本草》,乃唐甄权所著也。”此说流传甚广,现仍从之。(彩照6)

该书凡4卷,列述药物正名、性味、君臣佐使、禁忌、主治、炮制、制剂及附方等。对君臣佐使及禁忌较为关注。服药时的饮食宜忌也有不少记载。少数药物下有归经络或脏腑等。对于药物良毒,也有一些新的认识。如谓:“《本经》以丹砂为无毒,故多炼治服食,鲜有不药患者。”这在当时是较为难得的。所记药物主治有一些新的补充。如说:“藕节捣汁,主吐血不止,口鼻并皆出血”;羌活“能治贼风失音不语,多痒,血痹,手足不遂,口面咽邪,遍身顽痹”;柴胡“主时疾内外热不解”;梔子“通小便,解五种黄病,明目”等,均能切合临床实际。并在多数药物下附有方剂,颇与一般本草不同。该书着重论述药物性能、主治,简明详备。其作为我国本草史早期主要供临床医师使用的药性专著,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。惜原书已佚,北宋《嘉祐本草》引录其资料较多,计有400余条,现可见于《证类本草》。

5.《海药本草》 10世纪前半叶由李珣所著,全书共6卷,原书在宋末已佚,今存佚文涉及药物124种,其中新增药16种。所载药物大多是从海外传入或从海外移植到中国南方的。注明外国产地的药物有96种,如安息香出波斯,桐木出安南,龙脑香出(婆)律国,金屑出大食国等。

《海药本草》的编写体例是先述药物产地、形态、真伪优劣,次述其性味、主治、附方、服法、制药、禁忌、畏恶,也有对陶弘景、苏敬、陈藏器等所撰本草的补充和正误。其补充方面,如白茅香,《本草拾遗》说“能治腹内冷”,李珣说还“能治小儿遍身疮疱”;艾纳香,陈藏器说“能治癣辟蛇”,李珣则说“可取寸白,合蜂窠浴脚气良”。在正误方面,如缩砂蜜,陈藏器说味酸,而李珣说味辛平;迷迭香,陈藏器说“性温无毒,烧之去鬼”,李珣则纠正说“性平不温,合羌活丸烧之避蚊蚋”。另外一个特点是收载了很多香药,这些香药除供药用外,也有作熏燎、美容、调味,或作“果

子药食用”的。在文献方面,还收集了大量地方志的资料。总之,本书是我国古代介绍和研究外来药的一部专门著作,它对中外医药文化交流、充实本草内涵有着重要贡献。宋代《证类本草》首次摘引该书,保存其资料最为完备。

6.《食疗本草》 唐代医家孟诜所撰。为我国古代食物营养与治疗学专著。据《嘉祐本草》载,孟诜原著《补养方》后经张鼎补充89种药物后,总为227条而成《食疗本草》3卷。原书亡佚,其内容散见于《证类本草》中。敦煌遗书中发现的该书残本,现存于大英博物馆。

书中所载食物多为人们常用的米谷、蔬菜、瓜果、鸟兽、虫鱼及其加工制品,并较多地记载了动物脏器和藻菌类的食疗作用。所载的不少食物是唐以前本草所没有的,如绿豆、荞麦、菠菜、蕹菜、蕻菜、鳙鱼、鲈鱼等。该书对食物的食性、功能、主治作了辨别和论述,指出了禁忌,有的还记载了形态、修治、产地等内容。对食物性能、主治等方面的论述大多符合实际,有较高的研究价值。如菠菜“利五脏,通肠胃,解酒毒”;冬瓜“去头面热,热者食之佳,冷者食之瘦人”;野鸭“主补中益气”;狗肉“益阳事,补血脉……填精髓”;砂糖“多食……损齿,发疔瘡,不可长食之”。另在醋、覆盆子、杨梅等十几味食物条目下,还比较了南北方不同的食用习惯和效果,充分注意到食疗法的地区性差异。该书对妊娠妇、产妇、小儿饮食注意事项的论断大多比较合理。对若干食物配合、烹调加工也有阐述,如“羌蕤……作酱甚香美,功优于杏仁”等。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局限,书中难免有某些封建迷信的内容和错误的论述。

二、本草学术

(一) 生药学知识

自魏晋,尤其是陶弘景著《本草经集注》以来,药物的生药学知识颇为医药学家所重视。到了唐代,多数本草在所载药物下记述或补充了许多药物的形态、产地、采收、种植、鉴别、别名等内容,反映了当时生药学研究的新成就。(彩照7,彩照8)

1. 产地 许多中药材的出产都有一定地域性,有的还比较局限于某一地区,这类药材质优效佳,后世称为道地药材。《新修本草》孔志约序云:“窃以动植物生,因方异性……离其本土,则质同而效异。”药材质量优劣与产地有着密切关系,所以《新修本草》十分重视药材产地的调查研究。如说:“天雄、附子、乌头等,并以蜀道绵州、龙州出者佳。余处纵有造得者,力弱,都不相似”;栝楼根“今出陕州者,白实最佳”;“今沙参出华州为善”。孙思邈在其《千金翼方》中专设“药出州土”一篇,记载了当时133个州所产的519种药材。如河南道的陕州出栝楼,河东道的绛州出防风,淮南道的扬州出白芷,陇右道的宕州出当归等。这些道地药材多为其他地区产者所不及。

2. 采收、加工 隋唐时期,对药物的采集时间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。如孙思邈在《千金翼方》中论及采药时节,强调“采取不知时节,不以阴干暴干,虽有药名,终无药实。故不依时采取,与朽木不殊,虚费人功,卒无裨益。”他还在《千金要方·序例》中分析采药时节对药材质量、医疗效果都有很大影响,如云:“古之善为医者,皆自采药,神其体性所主,取其时节早晚。早则药势未成,晚则盛势已歇。今之为医,不自采药,且不委节气早晚,只共采取,用以为药,又不知冷热消息,分两多少,徒有疗病之心,永无必愈之效。”根据前人记载和自身经验,又专门整理总结了233种植物药的采集时节,并注明其处理方法。表明当时对药物的采收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。

关于唐代的药物加工,从孙思邈《千金要方》卷一记载中可知,当时的专用工具和设备有秤、斗、升、合、杵臼、绢罗、纱罗、马毛罗、刀砧、玉锤、瓷钵、大小铜铤、砧锤、铜匙、铁匙等多种,从一